

社工人才缺口大 七成人感觉社会认同不够

民调揭示社工人才最缺乏的三大领域:社会救助、社会福利、社区服务



2009年8月24日,北京人民医院首创社会工作服务部,为患者提供心理疏导服务。 CFP供图(资料图片)

本报记者 向楠
实习生 张锐珉

近日,北京市出台规定称,北京地区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以上学历的非京籍应届、往届毕业生,如报考社会工作者岗位,并连续两年考核合格,即可获得北京户口。此规定一公布,立刻引发公众热烈讨论。

上周,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新浪网,对2056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,16.7%的人表示自己享受过社工服务。34.4%的人表示自己对于社工的工作性质有所了解,但表示“不了解”的人只占8.4%。

75.3%的人认为自己身边缺乏能提供专业服务的社工人才

今年1月,北京市委社会工委书记宋贵伦表示,北京市理想的社工规模应在3.8万人,但目前全市社工人才只有2.8万,社工人才缺口达万余人。社工人才缺口大的地区不止北京一个,全

国其他地区也正面临同样的难题。

除了“缺口大”,社工“留不住”的问题也同样非常严重。据《京华时报》等媒体报道,2009年,北京市社工的平均流失率达50%,部分区县的流失率竟然高达三分之二。

此次调查中,75.3%的人直言,自己身边缺乏能提供专业服务的社工人才。其中,23.9%的人表示“非常缺乏”。

具体而言,受访者认为当前社工人才最缺乏的三大领域分别是:社会救助(66.5%)、社会福利(61.8%)、社区服务(56.8%)。接下来还有:法律维权(52.2%)、医疗服务(51.6%)、心理辅导(48.6%)、社会行为矫正(43.2%)、就业服务(41.3%)、婚姻家庭服务(28.0%)等。

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何雪松教授,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指出,在社工发展成熟的国家和地区,社工的数量一般要占到总人口数的千分之二左右,按照这一比例来看,我国社工人才的缺口无疑非常大。

为何社工人才缺口大、留不住?

北京市某高校2010届硕士生董君(化名),现在是北京市宣武区某社区服务中心的一名社工。一年下来,当初和他一起被选拔为社工的人已经走了近三分之一。究其原因,董君认为是工作太辛苦,工资太低,“社区的情况比较复杂,要做好社工必须付出大量精力,平时和节假日还经常加班。可是,我们的工资却非常低,只够勉强维持基本生活,根本没有吸引力。”

“在了解了社工的工作内容与工作环境后,不少大学生就觉得自己这么高的学历还做这种工作实在太委屈,与家人对自己的期望也相差太大。”董君说。

北京市宣武区禄长居委会工作人员贾女士,共事过好几拨儿大学生社工。她发现,在这些年轻人里不乏是为了混户口的年轻人。“有些大学生社工,刚入职就盘算着怎么做兼职挣钱,什么时候辞职考公务员,工作态度非常不好。大学生来做社工之前,应该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,如果只是为了混户口,那还不如不来。”

在上海市青翼社会工作人才服务中心项目合作部经理陈虹看来,社工人才缺口大、留不住与当前高校中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有关。由于我国高校社会工作专业起步较晚,大部分课程都引进自国外,还没有形成本土化课程,培养出来的人才很难适应对社工人才的实际需求。

“并且,当前社会上对社工的理解与认同程度也不够,不少人认为社工就是义工、志愿者,而且还没有居委会大爷大妈有经验,拿国家的工资完全没必要。”陈虹说。

调查中,受访者认为社工人才缺口大、留不住的两大主要原因是:人们对社工不认同,社工的社会地位低(70.1%);社工工资低(69.3%)。

其他原因还包括:社工人才培养机制落后(59.5%);社工工作不稳定,工作前景不明朗(58.9%);社工工作繁琐劳累(57.4%);社工职业资格认证机制不健全,专业化程度不够(56.5%)等。

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、社会工作硕士中心主任彭华民教授指出,当前我国社工工资普遍较低,难以维持基本生活,并且部分地区的社工工资还拖欠不发;其次,社工的社会声望也非常低。很多人只推崇能赚钱的工作,瞧不起社工。另外,人们对社工工作本身也存在一定的误解,不少人认为社工什么都干,忽视了社工的专业性。“试想,当一个受过专业社工训练的大学生,被分配到社区里去组织篮球赛、收水电费等,他怎么能在工作

中产生专业认同感?又怎么能长久地干下去呢?”

80.1%的人建议提高社工的社会认同度

调查显示,对于北京市以户口吸引社工人才的做法,25.6%的人表示“完全支持”,10.4%的人表示“反对”,大部分受访者(55.0%)虽然表示支持,但认为其并非根本性措施。

怎样才能解决社工人才缺口大、留不住的问题?调查中,排在前两位的措施分别是:提高社工的社会认同度(80.1%);提高社工的工资待遇(72.7%)。

“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主任马丽庄教授曾说,如果社会需要优质的服务,就需要用合适的价格去购买。”彭华民教授认为,我们急需建立起一套与公务员工资体系挂钩或持平的社工薪酬体系,为社工提供合适的报酬。

“在香港,一提到某人是社工,大家都会非常尊重他。因为在他们眼里,社工服务于社会,是社会的医生。内地目前做得还远远不够,我们需要给予社工更多的关注、关爱、支持与尊重。”彭华民说,同时,我们还应重视对社工专业人才的培养。“与去年相比,今年报考我们院社工专业研究生的人数有了大幅增长,达到220多人,居全国第一。但是,对于巨大的社会需求而言,这还远远不够。”

何雪松建议,应该建立起一套社工人才的职业等级体系,政府也应该更多地从一线社工中招聘公务员,扩大社工的发展空间,使社工的职业前景明朗化。

调查中受访者的其他建议还有:完善社工晋升通道,让社工从业者看到前景(67.4%);加大社工专业化程度(59.2%);增加社工人才数量(38.5%)等。

撤侨亲历者讲述:

利比亚大叔腾出儿子洞房 存放我们的物资



江源和利比亚男孩

实习生 孙婧
本报记者 唐轶

3月6日凌晨,北京企业最后一批驻利比亚务工人员全部安全撤离回国。北京建工集团职员江源,经历了这场撤离。江源在去年11月2日赴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工作。今年2月起,利比亚爆发的冲突及流血事件不断升级。在利比亚亲历战乱、撤离的日子,是江源至今挥之不去的回忆。

中国青年报:还记得战乱最初爆发时的情况吗?
江源:有一天早上5点,我被轰鸣声吵醒。当时天还没亮,朦胧中我看见一排直升机低飞而过,远处隐约传来枪声和叫喊声。那天我的朋友元元特意打电话来,让我在家里老实待着。但我好奇,和随行的阿拉伯语翻译软磨硬泡,他终于答应在换煤气时带我上街。

我俩开着车,连转两家液化气供应站,门都紧锁着。赶到第三家时,我们得知运气车刚开进去,门口等待换气的队伍已经排到了30米开外。四周只有蔬菜店和副食店还在营业,旁边的纸板上用红黑色字写着“鸡蛋已售罄”,每个店门口都排起了长队。翻译感叹:“利比亚人大概都不记得上一次排队是什么时候。”

中国青年报:看来社会动荡对当地经济影响很大。
江源:对。之前0.5个第纳尔(约2.5元人民币)就能买20个面包,1.5个第纳尔买一罐液化气。如果有3万~5万第纳尔,就可以盖起花园别墅。可是战乱后,银行早已停止营业,第纳尔出了利比亚就成了一堆废纸。我可以感到人们的焦虑和恐慌,我亲眼看着物价翻了一倍,男女老少全出动往家里囤积粮食,超市里米、面、鸡蛋全部卖光。

中国青年报:你害怕吗?
江源:在那种状况下,以前很多愿望都变得微不足道。我曾希望可以的黎波里一路向西,驱车驶入大沙漠里看沙丘和日落。然而在战乱中,我想得更多的是,万一出门就被流弹击中了呢?万一睡着时屋子就被放火烧了呢?

其实战争的可怕,是在人人自危的情况下所暴露的人性。在的黎波里港口等待撤离时,一位阿拉伯妇女走近我,用不流利的英语羞涩地问:“您能给我点儿食物吗?”我掏出刚买的一个冷馒头给她,身旁的大姐一把拉住我的手:“傻丫头,吃的得自己留着,船又不听你指挥,你知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开呀!”结果我犹豫了一下,坐直了身子,在此之后,打死我也想不到,我会为了一个馒头而忽视一位美丽女人哀求的眼神。

不过,就在那时我想起了一件事,使我改变了主意。撤离前一天,在街道已经设卡封锁的情况下,55岁的当地人贝鲁宁和他13岁的小儿子开着小货车,帮我们转移物资。他还腾出本来留给大儿子结婚用的屋子,给我们存放重要物资。贝鲁宁还不顾物价飞涨粮食面临断货的危险,给我们一人一份做了当地传统食物“库斯库斯”,让我们吃饱了上路。离别时,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,目光里满是歉意,仿佛打仗是他的错一般。我很难过,一旦真正打起来,我们至少还有祖国可以回去,工作了可以再找,丢了行李也可以再置办。但对于贝鲁宁一家以及像他们一样的利比亚平民来说,战火纷飞,通货膨胀,流离失所,骨肉分离,那样的灾难,不知道多久才能结束。

想到贝鲁宁大叔,我从袋里翻出两个冷馒头,塞到那位阿拉伯女人手里。我可能没有能力帮助面临险境生活的利比亚平民,但我至少还能让眼前这位妇女不因饥饿而如此难受。

中国青年报:你们撤离顺利吗?
江源:撤离的那天早晨,我们去工地了解情况,结果被一群外国雇佣工人围在中间。他们翻来覆去地重复着3个英文单词:“Please help us!”(请帮我们!)原来,该工地上百名孟加拉国工人拿到工资后就就地解散,但无处可去的工人们依然留在工地,守着他们剩下来的粮食。然而那日,除了他们自己的使馆,没人能帮得了他们。

我当时眼泪夺眶而出,在这样无助的境地,我们知道祖国在为我们担心,知道同胞在为我们努力奔走,知道家人彻夜守在电脑前陪我们一起失眠是多么幸福和踏实。

2月26日~27日,我们在港口滞留了8个小时,那两天都是大风大雨的天气,所以船一直没出发。我们一直冻得瑟瑟发抖。27日下午3点,我突然接到通知,失去控制的黑人务工人员已经占领码头。于是,船匆匆起锚离港。刚开出大约20米,我们就看到候船厅的玻璃门被砸破,几百名其他国家的侨民涌上码头。我不知道他们还要等多久,只有在心里默默地祈祷,希望能有足够的船让更多的同胞远离战火。

中国青年报:后来呢,你们是直接回国的吗?
江源:船一出港口,就遇见了暴风雨,十几米的大浪,一个接一个地打来。那条限载300人,仅限内河航行的小船上下颠簸,船舱里的呕吐声、哀嚎声此起彼伏。大概8个小时后,我听到一阵欢呼,小船终于抵达马耳他港口。

我们到达马耳他后,就有中国使馆的工作人员来接我们,把我们安排到马耳他旅馆。旅馆里住了150个中国人,此外还有菲律宾人、印尼人等。听说中国使馆还要安排从班加西、米苏拉撤来的同胞回国,那些船上还有4000多人,其中有很多人受伤或患有疾病。

当地时间3月5日凌晨5点,我们匆匆赶到机场,得知因为大雾航班要晚点起飞,并且只能随身携带一个拉杆箱。中国使馆的一位公务参赞在机场为我们送行,他一一握住我们的手说:“你们辛苦了!现在没事了,大家就要回家了。”

飞机飞了12个小时,我几乎睡了12个小时。大家都好累。当飞机缓缓降落到上海虹桥机场,我们走下舷梯,赫然看到公司的横幅“欢迎回家”,因为最后一趟撤侨飞机,各路媒体记者早就守候在机场。踏上祖国土地的一刹那,大家抱头痛哭,伴随着重生的喜悦,担忧和恐惧在那一刻尽情地释放了。



94.5%的人期望民调纳入公共政策制定程序

公众对各种民意调查机构的信赖程度不同,媒体最高(53.9%),其次是民间社团组织(51.3%)

本报记者 李涛
实习生 雷季洪

最近,北京市民祝斌因回龙观地铁站未规划停车场和停车位,致使自己无法开车换乘地铁,把交通管理部门告上法庭。近日,法庭已受理此案。

公众对交通规划满意度不高的现象在不少城市都存在。上周,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搜狐新闻中心,对3335人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,仅16.3%的人满意自己所在城市的交通规划,多达58.8%的人表示“不满意”,14.1%的人表示“一般”。

73.3%的人认为我国城市规划民意调查不足

回龙观社区是北京五环路外一个拥有30万人口的超大型社区,社区居民大多乘坐地铁上班。每天早上,乘坐公交车、开私家车前来换乘地铁的人数数以万计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三十三条规定:“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的公共建筑、商业街区、居住区、中(小)型建筑等,应当配建、增建停车位;停车泊位不足的,应当及时改建或者扩建。”

但令人费解的是,在人流和车流量巨大的回龙观地铁站前,竟然没有划定任何停车位或停车场。因无处停车,地铁站前的人行道、自行车道、主路两侧,都停满了私家车。出租车和各种“黑出租”,也在地铁站前无序停靠,更加剧了交通拥堵。

去年,负责管理该地区交通的北京昌平区交通支队,联合几个部门在地铁站前立起两个公告牌,划定了机动车禁停区,明令在地铁站前的指定路段内,禁止停放机动车。

祝斌看到公告后,每次停车换乘地铁,都把车停在禁停区之外的路边。但时隔不久,他仍收到了违规停车的处罚通知。祝先生不服,向昌平区交通支队和规划局分别提出信息公开请求,希望了解合法停车位的一些规划信息。但令他不解的是,至今两部门未出具任何书面答复。

随即,祝斌把交通管理部门告上法庭。他说:“如果一直没有合法停车位,我们所有开车换乘的人就永远处于被动违法状态,交警随时能来贴罚单,没完没了。”

今年两会期间,全国政协委员左宗申就呼吁修改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,缓解停车难。他



北京回龙观地铁站前没有规划停车场,大量开车换乘的乘客把车辆停放在道路两侧,地铁站出口对面,正在兴建一处商品房小区。 本报记者 李涛摄

在调研时发现,法律规定“机动车应当在指定地点停放”。而交警在执法时的解释是:机动车只允许在规定的地点停放,在其他任何非规定地点停放均属违法。他认为,这不符合法律的本意。

左宗申认为,对私权利来说“法无禁止即自由”。“机动车应当在指定地点停放”的法律条款,并没有对私权利的禁止,执法部门以此为依据进行处罚,没有法律依据。而且,纵观全世界的交通法规,大多实行“除交通标志明确禁止的地方均可停车”。我们执法部门的解释则与此相悖。对这种处罚,车主往往意见很大。

调查也显示,交警对禁停区之外的车辆加以处罚,仅12.0%的人认为合理,66.4%的人认为不合理,其余21.6%的人表示“说不清”。

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、清华大学法学院余凌云教授认为,在没有充分的停车位的情况下强化执法,的确不合理。政府最好在严格执法的同时,积极解决停车位不足的问题。

除立法和执法方面的原因,公众对城市交通满意度不高,与交通规划阶段不重视民意征集也有直接关系。调查显示,多达71.7%的人表示自己在城市在规划公交站、地铁站时,没有广泛征集民意;不足一成(9.3%)的人表示征集过民意;19.0%的人表示根本就不清楚规划部门是否征集过民意。

据了解,民意调查在很多发达国家,已成为制定公共政策必不可少的决策依据。而在我国城市规划中,尤其是与公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交通规划领域,民意调查的作用还远远没有发挥。调查中,

73.3%的人认为我国城市规划民意调查不足。

媒体成为公众信赖程度最高的民调机构

家住北京市五道口的陈先生,每天上班都在西直门换乘地铁2号线。提起换乘,他就一肚子抱怨,“每次换乘要走二三十分钟,既浪费时间又累人。”

北京其他地铁线路换乘站也大体相似,尤其是从八通线换乘1号线时,早晚高峰时间真可谓人山人海,四惠站换乘大厅不得不用金属栏杆引导千多人绕几个弯,以免大家蜂拥进入站台。但成千上万的人,拥挤在一起缓缓蠕动,每每看了都让人惊心动魄——一旦发生意外,毫无疏导、疏散的可能性,极易造成严重的踩踏事故。家住通州在国贸附近上班的王女士,对此“市政交通的死角”十分不解:“大概朝阳区没什么级别的干部还乘地铁上下班,不然怎么会年年一年熟视无睹?地铁票价统一多久了,1号线和八通线为什么还不能直通,让人们每天上下班都要你挤拥着长征?”

为什么地铁换乘要绕这么远?为什么不能尽量减少换乘?当初规划时没有考虑民生成本和安全成本吗?

“我们是先有城市,后有地铁,因此地铁位置的选择受到很大制约。”中国城市规划院设计研究院城市交通研究所所长赵杰,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举例,西直门地铁站在规划时,根本没

会跑到前面去。

江苏省泰州市从事文秘工作的严静表示,现在很多年轻人过于急功近利,幻想一毕业就有好工作,二十多岁就买房,四十多岁就退休,不愿意吃苦奋斗。而“麦兜族”则靠自己努力奋斗,不断寻找生活中的快乐,他们的精神难能可贵。

“麦兜族”的哪些精神最珍贵?调查中,73.8%的人首选“积极乐观”,其次是“脚踏实地”(70.1%),排在第三位的是“爱奋斗”(67.7%)。接下来还包括:勤俭节约(58.8%)、追求梦想(59.6%)、努力工作(59.5%)等。

本次调查中,一民意中国网网友留言说,其实并非事业辉煌、财富多就能让人快乐,大多数人都是平凡的,作为“麦兜族”,我们不能因为生活平凡就失去信心,“因为即使只是一颗小尘埃,也同样可以有自己的快乐,不是吗?”

96.8%的人表示身边存在“麦兜族”

本报记者 韩妹
实习生 耿剑

麦兜本是动画片里一只平凡的小猪。如今那些没有值得炫耀的家境,做事脚踏实地,过着简单快乐日子的人的年轻人,被称作“麦兜族”。这类人的标签是:爱奋斗,不等不靠不要,积极乐观,想有努力,工作,不嗜老。

上周,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新浪网,对1987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,28.6%的人认为自己就是“麦兜族”,53.4%的人表示自己身边存在“麦兜族”。此外,多达96.8%的人表示身边存在“麦兜族”。受访者中,“80后”占49.4%，“70后”占31.2%。

北京市某公关公司职员孙雨生(化名)称自己是典型的“麦兜族”。当年高考后,他接到哈尔

滨一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,但是他没有去读。他的理想是去北京,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。2008年,他通过自学考试拿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专业本科学历。毕业后,他先后在几个小公司工作,虽然不是很喜欢,但他一直坚持着,也在不断提升自己。

如今,孙雨生在做的是活动策划工作比较忙,经常加班熬夜,甚至有好几次他3天只睡了4个小时。然而,他并不觉得苦,“就算再辛苦我也会坚持下去,毕竟这里有自己的梦想,有机会我还是要去从事新闻方面的工作”。孙雨生表示,自己身边的朋友大多是大学时的好哥们儿、好姐妹,平时大家会互相鼓励和帮助。尽管收入不高,他们还是会尽量控制自己的开支,把积攒的钱寄给父母。

人们怎么看“麦兜族”?调查显示,44.6%的人认为“麦兜族”主要是“80后”。65.7%的人认为他们“不等不靠不嗜老,值得学习”;62.9%的人认为他

们“虽背负沉重负担,但努力争取幸福”;58.7%的人认为他们是“草根阶层的代表”;44.1%的人认为他们“工作压力大,心理压力更大”。同时,45.7%的人表示“社会应该给他们减压,创造宽松的环境”。

在北京青年压力管理服务中心主任熊汉忠表示,在每个时代都会有很多靠自己奋斗的群体,“麦兜族”是当今社会奋斗群体的代表,他们积极乐观的奋斗精神对于社会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,社会应该多鼓励这些人。